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2022年2月13日，海南三亚湾入海口，数百艘游艇游船结束海上之旅返港。
袁永东摄（人民图片）

海南——诗意中焕发光彩

吴　辰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海南的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自古就为文人雅士所称道。苏东坡的“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丘浚的“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杨维桢的“绿衣歌舞不动尘，海仙骑鱼波袅袅”，无不描绘出海南宛如仙境的动人景象。

诞生于山海之间的优美诗句，经过东坡诗词的熏陶，又在椰风岛韵中醇化千年，使海南诗歌如同一坛老酒，隔着海峡都能闻到其浓郁的香气。在一派热带风光中，悠然的人情与独异的风物交织在一起，把海的声音、春的颜色镌刻在诗人心上。常言道“沧海桑田”，在新时代，海南诗歌中的诗意因海南自贸港建设、三沙设市等大事，焕发出新的更耀眼的光彩。

上古遗风与东坡诗韵

海南最早的诗当属民歌，民歌的古风古韵至今仍在海南广为流传，影响了当代文艺作品的创作。著名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许多曲目都有海南民歌的影子，经典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就是以黎族民歌《五指山歌》的词曲为底本，雄壮有力的《红色娘子军连歌》中也能听到海南地方戏的旋律。陈光洲的《解放军来到侾黎寨》、谢青的《美不过黎家三月三》，还有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的《久久不见久久见》等都是海南民歌与当代艺术结合而产生的佳作。

毫不夸张地说，在海南，无事无物不能入诗入歌，乐天、达观、与世无争、与自然和谐共处是海南民歌的底色。也因如此，当仕途失意的苏轼来到海南后，竟意外迎来了创作高峰期。“野老已歌丰岁语”，面对海南岛处处蓬勃向上的生命，本就生性达观的东坡又有什么理由不释然呢？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在东坡诗词影响下，诞生了海南第一位举人，诞生了绵延千年的海南东坡文化，历代文人墨客由此隔空与这位宋代大词人应和、唱酬。当然，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当苏东坡为海南带来中原文化时，海南文化也影响着苏东坡。且看那一句“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字里行间也有了些黎家山歌的影子。文化的碰撞、交融，带给海南更加丰富、多元的诗意。

时代风潮下的诗歌创作

海南的诗意是火热的。20世纪的风起云涌搅动了海南诗歌原本恬然自足的诗意，唤醒海南诗人以切实行动投身火热时代。

在海南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征军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名字。原名施继仕的征军，1913年生于海南，是海南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左翼诗人。在那个民族饱经蹂躏的年代，征军用他的诗激励着琼崖儿女与强敌进行斗争，那个与世无争的岛屿在他笔下沸腾了：“海南岛，/我的母亲！/你的儿女在艰难中又扇起了红焰，活跃地唱着爱护国土的曲调。等着太平洋的波涛卷起暴风雨时，你就会在这浪头沐着新的阳光呵！你永远是南中国美丽的海岛。”（《海南岛，我的母亲》）海南在诗中化身为抵抗外敌的海上前哨，沐浴了战火洗礼的岛屿毅然背负起了艰巨的时代重任和历史使命。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海南，海南诗歌又在时代浪潮下呈现新的风貌。在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浩浩荡荡中，敢闯敢拼敢干的精神赋予海南新的诗意，激情与诗意的交织使海南成为了一个诗歌之岛。无论是否琼籍，在这座岛上的人们大多愿意写上一些诗，捕捉社会脉动下内心的悸动，这几乎成为此时海南生活的常态。

理想的回望与沉思

海南的诗意是深邃的。时代的需要带给海南诗歌以激情，也让海南诗人们常常回望，思索这座岛屿的前世今生，关注琼崖大地上众生万物的生存状态。他们以生活为原点，用诗歌拓展着自己认知的疆域。

影响了海南一代人精神的“闯海”，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还是一个精神事件，它为海南诗歌带来了理想与激情，成为海南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少君的长诗《闯海歌》就是对这段历史的回顾，那个“迷信海洋是史诗、英雄与奇迹发生之地”的少年，执著地要“在海上建一座宫殿或某种海市蜃楼”。从海口到三亚，从南海渔港到翡翠小城五指山，他见证着海南的历史与现在，畅想着海南的未来，最终骄傲地唱出了“我是有大海的人”。

海南的自然和人文都能引人沉思。张伟栋道出了海南对一个诗人的意义：“身体里有大海，那海水一遍一遍地/将我们吞没，而身体里的飞机/正载着我们飞在天上”（《感官之诗》）。海南以它的丰饶召唤着诗人将海浪的声音灌注进每一行诗句。江非则善于写河海交界处的沙洲与树林，写那些在入海口执著抛洒渔网的人们。他看到一块卵石在河滩上沉睡，发觉“在它还没有被从古老的大地中/分离出来时，就是如此静如黄金”（《落日下的河流》）。当然，激发诗意的并不仅仅是海洋与河流，还有那些屹立于海南中部的高山，年轻的诗人们正在山海之间寻找着海南岛文化的源流。比如黎族诗人李星青，用自己的爱与诗意书写着黎村的月色、春天以及充满希望的下一代。

驶向新的蔚蓝

海南的诗歌是与时俱进的。海南自贸港建设将海南推向了历史的前台，海南诗歌也在新时代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近年来，在《诗刊》社、海南省作家协会等组织的推动下，诗人们开始以集体的姿态向海洋进发，他们已不满足于探索这片岛屿的陆域，而是向宽广的远海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尤其是浩瀚的南海和美丽的三沙市，更成为诗意的源泉。

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坚守在一座座岛屿上的解放军官兵。军旅诗人王登平在造访三沙后感叹“你的平安，牵动着亲人的神经；/你的美丽，再也不容他人侵扰”（《西沙行》）；而曾经为名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作词的诗人苏圻雄再次为三沙放歌：“向南向南，爱抚千礁百岛，/向南向南，气贯辽阔海天，/向南向南，演绎人生精彩，/向南向南，书写三沙新篇。”（《向南向南》）在西沙“祖国万岁”石刻前，刘笑伟看到了一代代士兵“忠诚热血里最隐秘的那种红/最无悔的那种红/汗珠和血液提纯出的那种红/忠诚和大爱冶炼出的那种红”（《描红》）。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守护在南海上的英雄，诗人们才能够在这一片蔚蓝中发现更大的诗意——张定浩“在蓝色中分辨蓝色”“在岛屿上寻找岛屿”（《在三沙》），杨章池看到“三沙，三群洁白晶莹的沙子/在蔚蓝的向往中抱成一团”（《三沙，蔚蓝的绽放》）。来自各地的诗人们用自己的诗作筑就海上文化长城，守护着祖国的海疆，也呼唤着更多人加入到这支蓝色的队伍中，在理想的航船上满载中国梦，驶向新的蔚蓝。如今，不管是否生长在这片土地，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关注海洋，用“海洋的诗”汇聚起“诗的海洋”，拓展了新时代诗歌的表达空间。

随着自贸港建设的步伐加快，海南的诗意将更加丰富、瑰丽、精彩，海南的诗歌也将肩负起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正如乐冰在《我歌唱海南自贸港》一诗中所写：“时间会告诉未来的人们/海南的辉煌/有我们的汗水创造/有我们的责任和担当”。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文化只眼

儿童文艺创作要有分众思维

韩宵宵

当下，随着大众对儿童美育重视程度的提升，儿童文艺与基础教育、少儿成长的结合日趋紧密，儿童文学、儿童电影、儿童戏剧和儿童美术等迎来发展契机。但面对年龄差异较大的儿童受众群体，还有很多儿童文艺门类没有进行相应的年龄细分。

以近年来市场迅速扩张的儿童剧为例，此前上海儿童艺术剧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等在儿童剧演出的年龄分级上已经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但这种尝试更多是以演出季或戏剧节为契机。更为普遍的是，儿童剧的发行方通常不会把受众局限在某个年龄段，大多只是为了维持剧场秩序建议3岁以上儿童观看。但这是一个很宽泛的范围，4-5岁的学龄前儿童属于“3岁+”，6-12岁的学龄儿童也属于“3岁+”，很显然，他们的注意力、想象力、认知水平等都有很大区别。婴幼儿以形象思维为主，那些短小精悍、沉浸式的，以生动鲜活的肢体语言和画面色彩为主要呈现方式的剧目，更容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小学阶段的学龄儿童逐步建立了逻辑思维，需要更加丰富的语言和生动的内容，启发他们进行有意识、有目的、连贯性地想象；而中学生在心理上有了“半成人、半儿童”的特质，对剧目思想内涵要求更高——一部好的作品可以为中学生提供交流平台与情感释放出口，甚至为解决“成长的烦恼”带来启示。作为文艺领域中最特殊的一部分，儿童文艺面对的是年幼的生命，更要求艺术性和技巧性，强调对象化和差异化。因此，在对儿童受众进行高度细分与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健全完善儿童文艺体系十分必要。

如何在儿童的差异性中体察其艺术视界，满足其审美需求？或可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守住童心。李贽《童心说》云：“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既是儿童文艺的起点，也是目的和归宿。面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受众，需要以童心观之，内化于心，俯下身去与儿童一起进行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著名作曲家黎锦晖在创作儿童剧时，抓住不同阶段儿童的不同心理特点和兴趣来选择题材，亲自设计布景、舞台动作与步伐，让他的作品深受孩子们喜爱。

通力协作。对不同年龄段儿童进行审美需求的分析，不仅是一个艺术问题，更需要心理学、认知科学、教育学甚至社会学界的共同参与、通力合作，厘清不同艺术门类中儿童受众年龄段的划分依据，分析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思维、语言、心理特征，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儿童文艺创作确立理论坐标。近年来，相关学术机构、出版机构、教育机构等陆续合作开展中文分级阅读工作，推动发布《中国儿童分级阅读倡议书》《中国分级阅读参考书目》等，具有启示意义。

适应新变。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文化消费方式和习惯，儿童也不例外。比如网络流行文化的易变性带来了审美趣味的即时性，网络信息的多元化造成了文艺欣赏的碎片化。这一系列变化，呼唤文艺创作寻求新角度、新主题、新切入点、新突破口和新叙事方式，以满足儿童文化需求。

在差异性中观照“小不点”的大视野，去体认婴儿“咿咿呀呀”声中蕴含的最原初的生命萌动，去体察幼儿充满想象力的童话王国，去观照少年们青春飞扬的拔节向上，是儿童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作品面世，让孩子们在艺术的光芒下，茁壮成长。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编辑**）

《蓝焰突击》——讲述消防员成长故事

高　行

社会不断发展变化，那些有着光辉历史和极强荣誉感的行业如何将自身的优良传统以新形式传承下来，在新环境下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是从业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消防工作长期由公安消防部队承担，英勇无畏的消防战士是距人们日常生活最近的英雄。2018年，中国消防队伍转制，如今3年多过去，“火焰蓝”传承了“橄榄绿”的优良传统，在无数次险情中挺身而出，挽救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彰显了无私奉献、勇敢奋斗的精神。

近日播出的电视剧《蓝焰突击》，生动展现了消防队伍转制后的新面貌，讲述了当代消防队伍在传承光荣历史、不断开拓创新中，践行使命、服务人民的故事。剧中既赞美了以主人公李溪成、叶启恒等为代表的当代消防队员无惧艰险、迎难而上的英勇气概，也着重展现了他们在应急安全领域高超的专业素养。可以说，在平时，他们是努力钻研、善于学习的行业精英；在冲入险境时，他们是奋不顾身的铁血战士。这一点在剧中主人公李溪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本是普通少年，过硬的身手和满腔热血引起了消防队伍的注意，被破格招入。在队伍中，他从一开始凭借天生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行事，到一步步学会遵守纪律、团队协作，逐渐运用专业技术解决问题，从容应对复杂情况，最终获得群众认可。该剧注重呈现人物身上独一无二的个性以及他们从青涩到成熟的成长之路，令角色显得可亲可爱。该剧通过消防队员们的无畏身影、英雄群像和动人事迹，给观众带来感动，也有助于提高公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专家研讨王彬散文

本报电（文一） 王彬散文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王剑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诗刊》副主编王冰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到会发言。

与会者认为，王彬的散文行笔雅健而精致，情感天然发自内心，机锋锐利，往往切中肯綮。他的散文，在翰墨风骨间，不失语辞声韵之美，将历史与生命的曲折浮沉叙写得多姿有致，在当下散文中保持了对写作难度与格调的可贵追求，具有独特的“王彬式”印迹。有评论家认为，王彬的散文是对当下散文写作的某种突围，呈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古今观念之变；二是现代、当代自身小传统之变；三是写作手法之变。作者对现代性的切身体验、对传统文化养分的充分汲取，共同催发了此‘三变’”。

新文科视域下的比较文学教研

胡　志

新文科建设（即把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哲学、文学、历史等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教育）背景下，中国的比较文学正从边缘走向中心，其融通中西、跨学科的性质，被认为肩负了引领文科教学改革、培养学贯中西拔尖人才的使命。

近日，为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教学研究分会第7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举行。会议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教学研究分会、北京师范大学主办，来自90余所高校的230余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参会，围绕“新文科视域下的比较文学课程与教学”主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入研讨。

“比较文学”是一门在字面上容易引起误读的学科，有人甚至把“比较文学”误认为是对中外文学进行简单对比。实际上，比较文学是把寻找人类文学的共通规律和自身的民族特色作为追求，运用比较等方法，对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进行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系统研究的一门学问，既注重不同民族文学的自身特色，又具有全球性的眼光和国际化的视野。

目前，对比较文学认识的“窄化”现象依然存在，学科理论建设仍需加强，出版的教材虽多，但缺少统一而严密的学科理论体系，因此，如何培育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学科人才也成为年会重要议题。

围绕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慧林以中西方对“中国化”（sinicization）的错位理解为例，说明重置、重述和重构文明对话思想工具的重要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洪涛认为，世界文学与文学关系是比较文学的两翼，强调要把世界文学的研究经验融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重建学科理论基础。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伟昉认为，“同源性”“类同性”和“差异性”标志着比较文学研究进程中可比性探寻的三个重要阶段，充分证明了比较文学方法论构建是在可比性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可比性意识，就难以形成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关于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教材及人才培养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旭东强调，比较文学应与外国文学教学互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姚建彬指出，在教材建设上，应丰富并优化教材层级，建立更加适应中国教育实情、符合新时代要求和学科人才培养规律的中国比较文学教材序列。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范劲认为，将全球化理论、文学作品分析和文学思潮考察相结合，对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有重要借鉴作用。此外，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葛桂录总结了中外文学交流的三个阶段性特征，认为具备史料学、语文学的研究方法与思想史的研究视域，有助于实现文学交流史的研究目标。天津师范大学教授黎跃进认为，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有助于促进东方国别文学、东方区域文学和东方文学整体三个层次研究的创新和突破。